

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建设项目

MINZU WENHUA

JIAORONG YU YUANZAJU YANJIU

民族文化交融与 元杂剧研究

云 峰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建设项目

民族文化交融与 元杂剧研究

云峰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吴继平

封面设计:周方亚

版式设计:陈 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云峰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

ISBN 978-7-01-010830-8

I. ①民… II. ①云… III. ①元曲-文学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4322 号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

MINZU WENHUA JIAORONG YU YUANZAJU YANJIU

云 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28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830-8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从民族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元曲(包括杂剧与散曲),是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心愿。关于散曲研究已有拙著《民族文化交流与元散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记得早在三十多年前读大学期间,在学习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时,老师讲到元杂剧繁荣兴盛的原因,往往罗列诸如社会黑暗、民族歧视、不开科举、知识分子没出路等理由,当时觉得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那么通畅或者说富有说服力。后来随着参加工作,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民族文化交流的教学与科研,这种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了。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它自有封建王朝的弊端,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诸如一定程度的民族歧视及一度未开科举等。但对这些也要给予客观的评述,不能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就是元杂剧繁荣兴盛的主要原因。

否则一些现象就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比如说俗文学成为元代文坛主流,元杂剧爱情婚姻剧中明显的反礼教倾向和大胆的男女关系描写,元杂剧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团圆结局等。以元曲为代表的俗文学成为文坛主流已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元以前的中国文坛上诗词歌赋等雅文学占主导地位,元及以后明清以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俗文学占主导地位,其间元朝是一个关键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不得不从元代这一特殊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元杂剧爱情婚姻剧的描写也与其前后朝代有明显的不同。以王实甫的《西厢记》为例,其本自唐人元稹的《莺莺传》,《莺莺传》中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以始乱终弃结束,而王实甫《西厢记》中就大不相同。

《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真情相爱,在老夫人要悔婚约时,莺莺毅然与张生私会并成其床第之欢,莺莺的大胆泼辣与其后明清时期的同名剧相比较也是较为突出的。这说明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对当时中原的封建礼教的冲击,以及他们具有人本思想的婚姻观的影响。这亦得从元代这一特殊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关于元杂剧的大团圆结局问题,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据粗略统计,元杂剧大团圆结局的剧目占其总数的90%以上,而其前的汉、晋、南北朝、唐、宋的叙事文学作品之大团圆结局者平均为30%左右,而元以后以至于现当代的小说、戏剧及影视文学作品,大团圆结局亦占绝大多数,大团圆已成为人们占统治地位的美学欣赏观。这当然有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元代作为一个承前启后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作用亦是不可低估的。所以欲研究这一问题,同样要从元代这一特殊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去思考。

从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研究元杂剧,可以说目前已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如著名的元代文学、文献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修生先生在《元杂剧史》中专设《元杂剧与蒙元文化》一节,强调了认识蒙元文化背景对研究元杂剧的重要性。黄天骥先生在《元杂剧史·序》中更是将这一重要性强调到“否则不足以论元剧”的高度。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不了解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及其在元代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情况,在深入研究元杂剧以及元散曲、元诗歌时,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且不说作品的风格特征、人物性格、结构布局、音乐舞蹈等,单就从字面看有时候也会有看不懂的情况。如王季思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元戏曲》,其中第一卷第一篇收关汉卿的《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其开篇第一折为:“(冲末、净李存信同康君立上)(李存信云)米罕(蒙古语,肉)整斤吞,抹邻(蒙古语,马)不会骑。弩门(蒙古语,弓)并速门(蒙古语,箭),弓箭怎的射?撒因(蒙古语,好)答刺孙(蒙古语,酒),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塔八(蒙古语,酒醉),跌倒就是睡。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刺孩(蒙古语,贼

盗),都是狗养的。”元杂剧中类似这种借用蒙古族语者比比皆是,如果弄不懂其含义,理解作品是存在一定困难的。有时候不懂装懂,望文生义,还会闹出笑话。这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语言文字之影响》中有论述。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在对古代蒙汉文学、文化均有涉猎的情况下,不揣浅露写成了拙著《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其间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拙著主要想突出的是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或者说民族文化交融对元杂剧创作演出影响较直接者。至于元杂剧的渊源、名称、分期等拟在另外的著述中探讨。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重点研讨元代的民族文化交融状况,特别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融状况,为元杂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厚实的文化背景;第二章:《蒙古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及其政治经济等对元杂剧繁荣兴盛之影响》,开头介绍了学界有代表性的几种关于元杂剧形成繁荣的观点,即民族歧视压迫说、汉族知识分子地位低下说、待遇优渥说、民族文化交融说、杂剧自身发展说等,接着介绍了蒙古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之影响,语言文字之影响,蒙古统治者对戏曲歌舞的爱好与关注之影响,较宽松的思想政治等人文环境之影响,城乡经济繁荣为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群众基础等。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重点评介民族文化交融对元杂剧繁荣兴盛的影响;第三章:《俗文学成为元代文坛主流论》;第四章:《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之爱情婚姻剧》;第五章:《元杂剧大团圆结局与民族文化交融》;第六章:《反映多民族关系和描写北方少数民族生活之杂剧》;第七章:《北方少数民族杂剧家及其创作》。这样,分专题在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对所涉内容进行了评述,企望能对元杂剧的研究有所裨益。当然,由于笔者学识所限及这方面研究基础的薄弱,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1
第一节 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之特质及其交融·····	2
第二节 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学习·····	7
第三节 元代多民族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风俗习惯等 方面的相互交往与影响·····	34
第四节 元代多民族文人的雅集交往·····	54
第二章 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及其政治经济等 对元杂剧繁荣兴盛之影响·····	65
第一节 概说·····	65
一、民族歧视压迫说·····	66
二、汉族知识分子地位低下说·····	67
三、待遇优渥说·····	70
四、民族文化交融说·····	72
五、杂剧自身发展说·····	74
第二节 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之影响·····	77
第三节 语言文字之影响·····	89
第四节 蒙古族统治者对戏曲歌舞的爱好与关注之影响·····	104
第五节 较宽松的思想政治等人文环境之影响·····	111
第六节 城乡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和群众基础·····	121
第三章 俗文学成为元代文坛主流论·····	129
第一节 概说及学界评论·····	129

第二节 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审美观与文学作品之影响	135
一、蒙古族审美观之影响及元以前俗文学概况	136
二、蒙古族文学作品之影响	139
第三节 社会风尚与价值观的变化及文人学士参与创作	145
一、社会风尚与价值观的变化	145
二、文人学士参与创作	150
第四章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之爱情婚姻剧	153
第一节 中国传统婚姻模式及其在唐传奇与元杂剧中的反映	155
一、中国传统婚姻模式	155
二、唐传奇与元杂剧爱情婚姻描写之不同	157
第二节 才子佳人剧	164
一、貌、情是婚姻的基础	164
二、符合人性的欲望描写	167
第三节 文士妓女剧	173
一、妓女所受的歧视和欺凌	174
二、对妓女人格的尊重和追求自由的爱情	179
第四节 宗教道化剧中的爱情描写	182
第五章 元杂剧大团圆结局与民族文化交融	190
第一节 元杂剧及其以前文学作品结局对比及学者评价	191
一、元杂剧及其以前文学作品之结局对比	191
二、学界对元杂剧大团圆结局的评价	196
第二节 蒙古族文化以及文学对元杂剧大团圆结局之影响	201
一、蒙古族文化对元杂剧大团圆结局之影响	202
二、蒙古族统治者的爱好及特殊地位之影响	206
三、蒙古族文学之影响	208

第六章 反映多民族关系和描写北方少数民族生活之杂剧	211
第一节 反映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恋爱之杂剧	212
第二节 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抢婚”及恋爱等习俗对元杂剧爱情婚姻描写的影响	217
第三节 描写少数民族官员将领的杂剧	226
第四节 反映少数民族节日、饮食等生活的杂剧	229
第七章 北方少数民族杂剧家及其创作	239
第一节 杰出的蒙古族杂剧家杨景贤	240
一、杨景贤的生平经历及其创作	240
二、《西游记》	246
三、杨景贤杂剧对后世的影响	253
第二节 女真族杂剧家石君宝	262
一、石君宝的生平经历	263
二、石君宝的杂剧创作	264
第三节 女真族杂剧家李直夫	272
一、李直夫的生平经历	272
二、李直夫的杂剧创作	273
参考文献	280
后 记	293

第一章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元杂剧与元散曲一起合称“元曲”，代表了元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历代评论家给予其极高评价。代表者如王国维说：“凡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文学创作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研究元杂剧必须与元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而元代作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统一的中央王朝，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又与当时的民族文化交融密切相关。本章拟重点研讨元代的民族文化交融状况，特别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融状况，为元杂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厚实的文化背景。纵观元杂剧研究史，进而扩展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其与民族关系相结合已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论题。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先秦民族史》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等著作,从历史学方面把主体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为论述的重点。王国维、陈寅恪诸人则又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民族关系的梳理结合起来,取得突出成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涉及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与元杂剧关系的研究。今人李修生的《元杂剧史》中专设“元杂剧与蒙元文化”一节,强调了认识蒙元文化背景对研究元杂剧的重要性。黄天骥在《元杂剧史·序》中更是将这一重要性强调到“否则不足以论元剧”的高度。田同旭的《元杂剧通论》中亦有“蒙元多元文化对元曲的影响”一节,对蒙古文化对元杂剧的影响给予了论述。高益荣的《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和罗斯宁的《元杂剧和元代民俗文化》亦涉及了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的内容。李炳海的《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在宏观方面把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颇多创见。郎樱、扎拉嘎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从民族文化交流的角度涉及了元代文学。涉及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的论文也有不少。可以说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目前已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话题,已经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研究零散或宏观方面者居多,专题专著深入细致地对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者还很少,故该书在资料 and 理论借鉴方面还相对欠缺,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

第一节 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之特质及其交融

“元曲”习惯又称“北曲”,“北曲”者言其主要流传于北方也。故本书所论之“民族文化交融”主要指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文化交融。具体说北方少数民族,主要包括蒙古族及色目诸多民族,以及早已汉化的女真族、契丹族等。其间由于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故蒙古族的比重更大一些。而蒙古族又是当时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代表,故本书所论的“民族文化交融”,主要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业文化的交融。当

然,也要穿插涉及色目诸多民族及女真族等。

中华民族由祖国各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文化亦由祖国各民族共同创造。这其中汉民族文化应该说占据了重要的和主导地位,但其他各民族包括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亦作出了自己的宝贵贡献。

元代的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加上大家在一个共同的地域生活,因此还出现了民族的融合现象。当时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民族。以中原地区汉族为轴心,内迁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受到了汉族经济文化的重要影响,有的甚至融入汉族。如曾经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以及渤海族等,由于长期居住在中原汉族地区,深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基本上已经融入汉族。元朝蒙古族统治者也把他們视为汉族。如元朝的四等人中,蒙古族统治者将契丹、女真、渤海族划入第三等级,即汉人等级。这更促使他们融入汉族。所谓一等人的蒙古、色目诸族大量进入中原汉地,也导致了其学习汉文化,其中不少人已经汉化。如迁至江淮地区的西夏人(又称“河西人”、“唐兀人”)的戍军,初到时尚保留着西夏人的民族特点,后来基本汉化。蒙古、色目人进入中原汉地后,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取汉姓、与汉族通婚等。这是本书所要论及的蒙古、色目、契丹、女真、渤海诸族与汉族经济文化关系的基本框架。

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以汉民族为主创造和代表了中国农业文化,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族创造和代表了中国游牧文化。而从祖国各民族组成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意义方面来讲,中华民族从跨入文明门槛起,到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大规模侵入止,就面对着在温暖湿润、江河纵横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经济文化与在干燥寒冷的草原大漠中发育起来的游牧经济文化的冲突与整合这样一种文化生态类型。

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有质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与其自然环境(又称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密切相关。因为这三种环境形成的综合格局,决定了民族的文化心理诸特征。其中地理

环境虽然本身不是文化,但它却是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石。俄罗斯美学家、文化学家普列汉诺夫就曾说:不同类型的社会“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的”。^①

中国农业文化的地理环境主要指今黄河流域及江淮流域地区,游牧文化的地理环境历史上主要是指今东起嫩江流域西至天山,南起长城北至贝加尔湖这一片广大的草原地区。农业文化区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有江河灌溉的便利,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热能和水分,故农业最早得到发展。游牧文化区多处北寒带地区,少雨干旱,多为草原和大漠,是流动畜牧的广阔场所,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正是由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地理环境经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生活于其间的各民族文化类型的塑造奠定了物质基石,使其文化若明若暗地熏染了地理环境提供的色调,影响到了其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如大河农业文化的稳定持重,与江河灌溉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有关;草原游牧文化的粗犷剽悍、向外扩张,与来自草原多变的恶劣气候提供的“射生饮血”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

地理环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并从多方面影响了生活其间的各民族文化,但这种影响是通过人的自身活动实现的,人文因素是转变为现实的选择动力。人与自然之间呈双向交流关系。一方面,人类的活动始终受到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样,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就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形态。如前所述,从事农耕经济的中原汉族聚居区,人们如不出现大灾荒、大战乱就甚少迁徙,即“固土重迁”,并多年形成了保守性和受容性极强的文化心态。而与追求稳定的农耕人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从事游牧经济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他们无城郭,无耕地,迁徙无定,游牧为主;全民善骑战,极其勇猛强悍;畜牧、狩猎和从事扩张战

^① [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卷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78页。

争,是其生活方式的两个互为补充的方面。

这样,历史上中华民族从事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形态的人们就一直存在着长期对垒和互补、融合的局面。对垒是相对的,互补、交流、融合是绝对的。从对垒的角度讲,骑马游牧民族虽然经济文化一般处于较落后的地位,物质文明发展程度低于中原农耕民族,但他们善于骑射和勇猛剽悍,使其武功十分强盛,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农耕人往往难以抵敌。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是中原农耕民族采取守势的很好证明。

但互补、交流与融合才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两种文化的永恒主题。实际上双方的对垒战争亦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的一种激烈形态。一方面,游牧人虽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落后的地位,但他们也有其明显优势:其一,孔武善战,骑射为其绝技;其二,流动生活,成为异域远方文化的传播载体。在中国古代,中原农耕人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收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并以粗犷豪放的游牧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复壮剂与补强剂。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①使赵国迅速强大起来就是典型事例。唐代承魏晋南北朝以降汉胡文化融合之势,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是构成唐代繁荣昌盛的动力之一。北方游牧民族还由于它的流动性强,能够学习别的民族的先进文化,将西域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原农耕区。如契丹战胜回纥得到西瓜,又把种植西瓜的技术传给中原汉人;^②宋代仿效“回回炮”,^③并加以改进推广,都是农耕区受到游牧区积极影响的生动事例。由此可以说明,经济文化相对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原农耕区汉族人民,对北方游牧民族及其游牧文化是抱一种宽容接纳和积极学习态度的。虽然也不乏自视先进、鄙薄异族的事例,但总的来说还是能接纳和学习的。其突出

① (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卷一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二十五史》1,1986年版,第319页。

② 参见(宋)洪皓:《松漠纪闻》续,收入《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三辑,内蒙古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印内部资料本,1985年版,第76页。

③ “回回炮”系当时固定词汇,此处加引号径称。下同。

者如唐太宗就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①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②表明了盛唐文化的恢弘气度。至于元代与清代，更由于系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学习接纳游牧文化就更不在话下了。元、清两代统一长城内外，以疆域空前展拓，异域八方文化大聚会大繁荣而彪炳史册。

另外，从游牧文化的角度来看，游牧人则更大量地从农耕人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科技文化，以至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俗等，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飞跃。其间尤引人注目的是，以征服者身份进入农耕区的游牧人在高势能的农耕文化氛围中，往往“为被征服者所同化”。^③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号召学习汉文化，《北史·北魏孝文帝纪》记载说，魏孝文帝元宏“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④他大刀阔斧地实行以三长制、均田制为基本内容的汉化改革，使北魏社会迅速发展。元代蒙古族人入主中原，亦热衷学习汉文化，促进了社会进步。从后金努尔哈赤开始，到清康熙、乾隆，更是汉文化高手，使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又一鼎盛期。从这些游牧、半游牧民族的领袖人物身上，看到了他们学习接纳汉文化的渴求与积极性。当然，一般百姓身上也同样有这种渴求，这样的记载史不绝书。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和游牧两大文化区绝非是自我禁锢的系统，它们往往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形式，进行交流融合，不断互补，历数千年，方融会成今日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因此，“在

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89页。

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81页。

③〔德〕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9页。

④（唐）李延寿：《北史·北魏孝文帝纪》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二十五史》4，1986年版，第2907页。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在长期既相冲突又相融会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① 其间,在元朝时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在对待汉文化等方面,学习借鉴了其前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交流的经验及其教训,并影响到了其后的清朝统治者。

以上从理论方面简要论述了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各自的特质及其互相融合交流以至冲突的概况,由此可见,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地区的关系是在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冲突、交流与融合中进行的。其结果往往是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充满生气、充满活力、不拘一格、豪迈刚健的游牧民族,向中原农业地区发起冲击,最后不同程度地受到融合。而具有理性因素和承受能力,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原农业民族,在冲突中主动或被动地吸收接纳游牧文化,为自己补充了新的文化因子。这样,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生机,使中华文化充满活力。如中国历史上的所谓胡汉文化冲突,往往在强大的朔方冲击波面前,能使中原文化摆脱柔靡、软弱,焕发出刚健青春气息。从这一点来看,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交流与融合,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我们研究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之关系,把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节 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学习

蒙古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关于其族源迄今学术界尚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蒙古出自东胡。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蒙古族就是由其中的室韦一支发展而来。“蒙古”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旧唐书》,称其为“蒙兀室韦”,《新唐书》则称为“蒙瓦”,辽金时又作“萌骨”、“忙骨子”、“萌古

^①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

斯”、“蒙古里”等,是“蒙古”的同名异译。起初仅仅是一个部落名称,游牧于今额尔古纳河南岸一带,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公元12世纪以前,蒙古部散布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一带。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族杰出人物铁木真(1162—1227年)把蒙古各部统一起来,并于1206年被推举为蒙古大汗,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从此,蒙古汗国所属各部,共用“蒙古”(忙豁勒)这一名称,蒙古部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

蒙古汗国成立以后,成吉思汗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在蒙古地区建立分封制度,设置护卫军,颁布“大札撒”法典,任命“札鲁忽赤”(即断事官)等,巩固了蒙古族内部的统一,发展了蒙古社会政治经济,使蒙古汗国空前强大,蒙古民族呈现出勃勃生机。接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先后灭亡了西夏、金政权。成吉思汗孙忽必烈(元世祖)于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取《易经》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灭了积贫积弱的南宋政权,统一了全中国。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近500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国土空前扩大,“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辽辽左,南越海表”。^① 西藏等地第一次纳入中国版图,中外交往空前活跃,全国各族人民得以在比较安定、呈开放状态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蒙汉文化及文学交流亦可在更大范围内深入展开,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周良霄在《元朝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中,对元朝的统一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归纳为如下四点:“第一,元朝的大统一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第二,大统一为南北方经济的恢复、交流和进一步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第三,它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上,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第四,推动了科学

① (明)宋濂等撰:《元史·地理志一》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